

劳务派遣公司的火暴,意味着有更多按照新法可以和企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将不再是所服务企业的员工,而只是由劳务公司派到企业工作的人员——较之此前引起舆论关注的“华为风波”而言,劳务派遣对员工利益的损害显然要更大;不仅会严重损害老员工的情感,而且还要向劳务公司缴纳一笔占工资3%到5%的管理费。不仅如此,他们还得面临劳务公司和用工单位“合谋压低工资”的可能。

就此,《南方周末》提出质问:为什么立法者自认为做了足够严苛规定的劳务派遣,反而会成为众多企业集体规避新法责任的出口呢?其实,不妨将追问更进一步:为何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鲜明特色的《劳动合同

劳务派遣,这个本以为要被新《劳动合同法》打入冷宫的行业却意外因为这部法而繁荣起来。现在很多企业纷纷在年底前突击把一些员工改为劳务派遣,以求把企业的成本和责任压到最小

劳动合同法不应留下法律“漏洞”

法》所实际达成的政策效果,却是一再对劳动者利益的伤害呢?

最容易想到的,当然是法律设计和实施中的不完善。试想,如果《劳动合同法》能够立即施行,而不是拖到半年多以后,那么眼下的辞退老员工风潮以及“华为示范效应”,恐怕就不会发生。同样,如果《劳动合同法》不只是粗略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而是对用人单位使

用派遣员工的具体条件以及占用工总数的百分比等做出更明确的规定,企业这种使用“劳务派遣”的手段规避新法就不像这般可以任意而为,情况也许就会好很多。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律设计的不完善远不是全部的原因所在。劳资双方权利的极度不平等,是当下不可回避的现实。当一部法律试图保护处在权利弱勢的劳动者,而又不可能面面俱到时,那么劳动

者不仅享受不到好处反而还要受到伤害就几乎成为必然。因为强势的资方总能找到“报复”劳动者的办法:要么提前辞退,要么改成劳务派遣,要么找到其他的漏洞。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应该被忽视,那就是在很多地方,感激劳动者只是挂在官员的嘴巴上,而感激投资者却体现在实际的亲商政策中。法律如果得不到执法者的切实执行,那也不过就是一纸空文。有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劳务派遣公司有26158家,其中由劳动保障部门经办或审批的为18010家,接近70%,很多劳务公司就是地方社保局的下属企业。“劳务公司政府办”,这是劳务派遣非正常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作为执法者的地方政府部门与企业结成联盟,共同合谋从劳务派遣中得利,那么《劳动合同法》又怎能真正保护劳动者呢?

燕赵都市报(舒圣祥)



北京投资10亿元修缮胡同四合院

北京晚报“我是这次胡同四合院改造的首批受益者。没花一分钱住了新房子,而且没有离开住了50年的老院子。”昨天下午,在胡同四合院整治修缮专家座谈会上,家住西城博学胡同的曲大叔高兴地说。

北京市斥资10亿元,启动了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城区内的胡同四合院改造工程。通过“改善、修缮、疏散”的方式,让许多像曲大叔一样的居民在原地住上了“新房子”。

自2006年底,北京市启动了胡同四合院整治修缮工程,并率先在西城进行试点。今年,东城、宣武、崇文纳入试点范围,东四、博学胡同、烟袋斜街……一条条胡同正在焕发新活力。“以前说改就拆,说保就不修,两个极端做法都不对。”“大拆大建破坏风貌,费力不好,不仅搬迁费高,胡同里盖洋楼的做法更显得不伦不类,新做法既省钱又实用。”专家认为,新做法符合北京作为历史名城的情况,值得推广。(李海霞)

新华每日电讯“80后”步入“成家立业”的年龄。对于多数人来说,结婚买房的需求迫在眉睫。面对高昂的房价,不少父母在即将退休的年龄当上了孩子的“房奴”。

哈尔滨的常先生将自己在市中心的住所让给孩子,老两口搬到郊区一个小户型房。“自己首付,自己还贷”,一项对“80后”独生子女购房情况的调查显示,买房首付需要父母赞助的比例接近七成,在受调查的4783名参与者中,完全靠自己力量缴纳首付的仅占34.10%

“80后”购房:父母充当房奴

常先生自嘲,“快退休了,自己还成了房奴”。“有房才能成家,成家才能立业”,在传统观念影响下,许多稍有能力家长选择了在孩子结婚买房的“关键时候”帮孩子一把。

在哈尔滨一个新开楼盘售楼处,售楼人员告诉记者,许多年轻人来看房有父母陪同,买房时很“痛快”。60~90平方米中小户型销售最快,成交价多在50~60万元。年轻人购房多选

择按揭贷款,而且要求月还款尽量低,还贷时间尽量长。在这些购房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父母承担首付,还有不少家长甚至将房款一次付清。

不少年轻人表示,父母奋斗了一辈子,节省了一辈子,到退休了还要为自己背负购房压力,自己也感到痛心。

但面对结婚阶段的住房困难,父母是唯一能帮助自己的人。于是,在一对购房新人后面,常有三个家庭在支撑:双方父母拿出首付,子女自己完成按揭。甚至有的子女不能独立完成月供,部分按揭款需要父母帮助。

三个家庭供一套住房。对绝大多数工薪家庭来说,这份“爱的代价”让家长在步入老龄阶段背上了沉重负担。(刘景洋)

“悄悄来,突击干,悄悄回。”如今已是上海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董事长的林生,在回忆20多年前自己的“星期六工程师”生涯时,用了这九个字来形容当初的状态。在1990年“下海”之前,林生是中科院上海某研究所的科技人员。

1985年,《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以一篇《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文章,报道了许多工程师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的情况。这是这个群体第一次被定义。当时国家科委的一位负责人说:提出“星期六工程师”,是广东的一大发明。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锡、常地区就已占尽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他们都在悄悄逃离本单位的牢笼。”林生说。

这些“星期六工程师”都来自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最初的时候,只是少数人员通过各种关系与周边的乡镇企业建立联系,利用节假日时间为企业担当技术顾问,并从中获取适量的报酬。“其实那时都算有些机缘巧合吧。”林生说。

渐渐地,这个人群开始壮大起来。据说那个年代,在上海郊区以及苏南浙北,乡镇企业的厂长们往往都随身携带着一张“联络图”,上面写着那些“星期六工程师”们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等。只要一遇到技术难题,凭借这张联络图,厂长们就可以打电话或登门求教。

而一些媒介也充当了城乡交流的“月老”。上海广播电台的《城乡经济》节目,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并红极一时。他们在节目中陆续播送上海乡镇企业需要哪些专业人才,又介绍上海各系统一大批科技人才、技术工人的技术特点。

对于当初求贤若渴的民营企业而言,“星期六工程师”所起到的作用自不必言说。那个年代,“星期六工程师”在上海周边地区尤其吃香。他们的收入自然也不菲。“一般一天能有个四五百元钱吧。”林生透露。

林生回忆说,一到周六下班后(那时是六天工作制),他就会和许多“星期六工程师”一样,挤上当晚南下杭州的火车。“就是那种绿皮车,很挤的,常要双手举起才能站立。”深夜到杭州之后,一般都是先找个洗澡堂住下。周日一早再赶汽车,到下面的乡镇企业。周日晚上还要在杭州挤上回上海的火车,周一早上,必须准时出现在单位的实验室里。“要不,周一领导见不到人,就乱套了。”回上海的车票,有时托在车站工作的朋友买。有时找不到人,买不到火车票就得想办法混进车站,“这是常有的事。”

不管是“星期六工程师”,还是“辞官下海”,都为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对接”提供了可能

首批国营机构科技人员下海记

位曾找他谈过话。这也成为林生日后彻底逃离事业单位而“下海”的原因之一。

直到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下达了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至此,争论才总算尘埃落定。而事实上,在那时,民营企业聘用科技人员已是一个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现象。吴晓波认为,这份文件已成为一个追认式的“马后炮”。

此后的1992年,真正意义上的官员下海成为时髦。“停薪留职”作为“下海发财”的代名词,开始流行于大江南北。

所谓“停薪留职”,即是保留原有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下海”失败,仍可“回朝做官”,这听上去的确是毫无后顾之忧的赚钱法门。

于是,为了体验“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许多怀有梦想的官员们都开始心为所动。

曾在上海卢湾区某经济部门任职的李海涛就是其中的一员。李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宏观层面的人士,又因工作需要曾接触过不少私营企业主。这些都成为他日后下海的便利条件。不过,李海涛在商海十几年浮沉,磕磕碰碰中竟有些后悔当初的逃离。

当然,还是有不少当年辞官下海的人,如今都成了业内的翘楚。中国新闻周刊(谢良兵)

四起,其中一种激烈的反对观点是:工程师在国营企业工作,拿的是国家的工资,怎么能用“国家资源”来填自己的腰包?

林生也回忆说,他当时做“星期六工程师”的事情,后来被所在单位知道了,单位

新民网报网互动平台:请访问 HD.XMNEXT.COM,在页面搜索框输入文章后缀编号即可参与互动。 博客:访问记者的博客 详细:获取更多信息 评论:发表评论 调查:参与投票 爆料:提供新闻线索或与本文相关的信息 征集:征集新闻线索、征文等

市百一店第一百货商店

市百一店扩建新妆即将盛大开幕 诚邀新老顾客光临

魅力融冬 让利大众

活动日期: 12月15日~12月16日

仅限2天

3~5折

参加大类:

- 地室皮具、鞋类
- 二楼女装
- 四楼淑女装、床上用品、牛仔
- 一楼羊绒、羊毛衫、针织内衣
- 三楼男装
- 六楼童装、童鞋 (个别柜台不参加活动除外)

● 一楼镶嵌类饰品、珍珠玉器5.8折

市百一店第一百货商店 地址: 南京东路630号 电话: 021-63223344转